

无冕影后——

阮玲玉

朱 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尤冕影后
阮玲玉
朱 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5 千字 印数: 1—15000 册
ISBN7-311-01122-1/K·136 定价: 12.00 元





目录

一 苦难童年	(1)
降生	(1)
丧父	(5)
磨难	(11)
帮佣	(15)
二 少女时代	(20)
入学	(20)
憧憬	(24)
热潮	(28)
初恋	(33)
同居	(37)
三 步入影坛	(42)
谋生	(42)
求职	(47)
应考	(52)
试镜	(57)
《挂名的夫妻》	(63)
四 早期作品	(70)
立足	(70)
《洛阳桥》	(77)
《白云塔》	(83)

五	不幸人生	(91)
	冷遇	(91)
	思变	(97)
	彷徨	(103)
	轻生	(107)
六	柳暗花明	(115)
	转机	(115)
	《故都春梦》	(120)
	北行	(126)
	归来	(132)
七	声誉鹊起	(140)
	《野草闲花》	(140)
	崛起	(147)
	赞誉	(150)
	心病	(158)
八	走向辉煌	(165)
	变革	(165)
	《三个摩登女性》	(172)
	《城市之夜》	(179)
九	重入迷途	(189)
	旧轭	(189)
	迷惘	(193)
	新枷	(200)
十	鼎盛时期	(207)
	《小玩意》	(207)
	《香雪海》	(214)
	《神女》	(221)
十一	命运多桀	(230)

《新女性》	(230)
围攻	(237)
失落	(244)
十二 明星殒灭	(253)
讼起	(253)
人言	(260)
绝境	(266)
自戕	(271)
哀荣	(277)
身后	(281)
后记	(289)

— 苦难童年

降 生

1910年4月26日，上海。

天刚朦朦胧亮，机器工人阮用荣匆匆地吃了一碗泡饭，夹起饭盒走出了低矮的家门，又转身把门轻轻带上。妻子在床上似乎叹息了一声，阮用荣稍稍犹豫了一下，仍然迈开步子汇入了上早班的人流之中。

一个多钟头后，阮用荣赶到了位于浦东的亚细亚火油栈，他在这家由英商开办的油栈里当工人。一路上紧赶慢赶，总算赶在了几百米开外的纺织厂第一遍汽笛声传来之时跨进了油栈的大门。这汽笛是纺织厂夜班与早班工人交接班的信号，会持续三五分钟，当它停止时，恰好是油栈工人上班的时候。数分钟后，它又会再次响起，随着这第二声汽笛，满面倦容的夜班纺织女工们将会涌出工厂的大门，陆续走过油栈的门口，而这时，油栈的工头已站在大门口，记着迟到工人的名字，谁要是“榜”上有名，就难逃被扣工资的厄运了。

阮用荣那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已很艰难，如何敢再让工头扣去，因此，平日他总是早早地起床，匆匆漱洗一下，接过妻子递上来的早饭，胡乱扒拉两口就出门了，妻子总是倚在门口，目送他的身影隐入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而最近这几天，阮用荣执意不

让妻子一大早爬起来为他做早饭，眼看着身子越来越沉即将分娩的妻子，他真想能陪伴在她身旁，可是，不上班又哪来钱呢？又拿什么来买米买菜呢？既然不能陪伴在身旁，阮用荣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让妻子多睡一会儿了。

阮用荣人到了油栈，可心还在家里，这个家虽然贫穷简陋，但毕竟是他一番艰苦创业才奋斗出来的，他深深地爱着这个家。阮用荣并非上海土生土长，他的老家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左步头乡。^[1] 1871年，他在故乡出生，少年时代，因遭遇连年灾荒，家境贫寒，使他饱尝了饥寒交迫的滋味，也使他鼓起勇气，跟随亲戚闯进了上海滩。为了生存，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他曾在十六铺码头当过扛夫，在静安寺东‘愚园’的花神阁做过花匠，还在四马路‘青莲阁’茶楼门口摆过水果摊。”^[2]然而，这些工作都很不稳定，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积下两个钱来成家了。后来，他的广东同乡们设法给他凑了一笔钱，为他在亚细亚油栈交了保证金，他才得以在该油栈的机器部当上了一名工人。亚细亚油栈虽然号称上海三大油栈之一，但比起老牌的“美孚”和“德士古”来，实力要小了许多，只能靠廉价占据市场，因此工人的工资也就特别低。阮用荣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每个月也只能拿到三担米的工钱。他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攒下了一点钱，终于在35岁上成了家，新娘何阿英是他的广东同乡，比他小14岁，人虽算不上漂亮，高高的额头使一张脸显得过于长了一点，但特别贤慧。他们在上海的朱家木桥祥安里租了一间小屋做了新房，三年后，他们的长女出世了。随着孩子的出世，清苦的生活也有了些许欢乐，只是孩子因营养不良长得十分瘦弱。现在，年近不惑的阮用荣又将迎来他的第二个孩子，他真是又喜又愁。新的生命的降生令他欣喜自不待言，但又要多添一张吃饭的嘴，也令他犯愁。

漫长的十个钟头后，阮用荣终于听到了下班的钟声，他放下了盘在头上的辫子，带着满脸的疲惫，行色匆匆地赶往家中，在

离家几步远时，一声婴儿的啼哭传来，他的心猛地一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了家门，果然，就在他上班的时候，孩子降生了。妻子半倚在床上，背靠着一床破被，怀中抱着刚刚出世的婴儿，一岁多的大女儿坐在妻子的身旁，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怀中的小生命。这情景让阮用荣的鼻子有些酸酸的，他感到有些对不住妻子，在她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却没能在她身旁，可穷人又有什么办法，明天还不照样得去上班。妻子告诉他，是邻居们听到她的呻吟，为她请来了接生婆，孩子才得以平安出生。他猛然想起早晨离家时妻子的一声叹息，他问妻子是否早晨就有感觉，妻子点了点头，这回轮到他叹息了。

他从妻子手中接过孩子，妻子不无遗憾地告诉他，又是一个女儿。他的心头也掠过一丝遗憾，他和妻子一样，盼望能有一个儿子。但是看着精疲力尽的妻子，他没让自己的遗憾有些许表露。他低头凝视新生的女儿，巴掌大的小脸上，五官很是匀称，细细长长的眼睛微微睁开，笔直的鼻梁下，一张小嘴巴在轻轻地蠕动着，阮用荣的心头升起了一股暖流。他在妻子的身旁坐下，动情地说：“你看，我们的小女儿长得多漂亮啊！”

看着丈夫脸上满足的笑容，妻子也变得高兴起来，“给女儿起个名字吧！”

“就叫凤根，好吗？”

“这可是个男孩子的名字呀！”妻子马上意识到，其实丈夫早就把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当然，在丈夫的心目中，这即将诞生的孩子一定是个男孩，而今他把这个名字给了女儿，那是希望女儿长大后有出息。于是，她马上附和丈夫的意思说道：“这名字好，我们的凤根将来一准比男孩子还强呢！”

“是啊！我们家也许真能飞出个金凤凰呢！”

阮用荣夫妻俩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对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有着许多美好的遐想，同时，他们也知道，像

他们这样的人家，真能飞出金凤凰来，又是多么的不现实。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们的梦想真的实现了，他们的凤根成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她就是风靡30年代中国影坛的阮玲玉。可惜的是，阮用荣没能熬到这一天。

说到电影，阮用荣还是略知一二的。当年他曾在四马路“青莲阁”茶楼门前摆过水果摊，这“青莲阁”就是上海最早进行商业电影放映的场所之一。1895年电影正式在法国巴黎诞生，第二年就传入了中国，这一年的8月11日，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电影首次在中国放映。（据有的学者研究，早在1896年之前，尚处草创阶段的电影，亦可能曾传入中国。^[3]据目前所得资料，1896年上海徐园的电影放映，当为举世公认的电影时代到来后中国的首次电影放映。）电影这个新奇的玩意儿传入中国后，人们称之为“西洋影戏”，以别于中国古时即有的同样是借助于光和影来表演的皮影戏。把电影带入中国的当然是洋人，电影传入中国，也是首先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站稳脚跟的。

作为时髦的新奇玩意，电影最初多在娱乐、消遣场所放映。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到上海后，即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携带一架半新的放映机和几本残旧的短片，来到上海，想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发一笔横财，但由于不谙中国国情，不了解上海人的兴趣，加之放映地点较偏，影片又旧，效果不好，苦心经营四年，仍未遂愿，只得转手给了其朋友西班牙商人雷玛斯。雷氏久居上海，熟悉民情心理，深知小市民喜欢噱头和花样翻新，接手加伦白克业务后，即弃其旧片，向设在上海的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分公司租购了数套新片，试图以新奇取胜。他租下了四马路“青莲阁”楼下一层专作放映室。“青莲阁”名曰茶楼，实乃一游乐场所，楼内设有小型游乐场，又处在公共租界的繁华地段，电影开映后，更是热闹非凡。“青莲阁”的门口，于是就云集着许多卖花

卖水果的小贩，阮用荣曾厕身其间，摆过水果摊。

虽然成天守在“青莲阁”的门口，阮用荣却从来也舍不得掏钱买票去看一场电影这个“西洋景”，小本经营的水果生意并不好做，地痞流氓的骚扰、气候的突然变化，都会导致亏本，日子过得很艰难，哪里有那份心思和闲钱来看电影。可大上海有钱人多得是，阮用荣守着水果摊，看着那些有钱的“白相人”熙熙攘攘地从电影放映室中涌进涌出，兴奋地谈论着电影中的所见所闻，对他的小水果摊却不屑一顾。电影放映室门口，成天都有身着洋装的吹鼓手击鼓奏乐，每当有新片上映，雷玛斯总会雇人掮着写有诱人的广告词和绘有醒目图片的广告牌穿行于附近的大街小巷，以招徕观众。几年下来，“青莲阁”外的水果小贩阮用荣仍一贫如洗，而“青莲阁”内的电影商人雷玛斯已腰缠万贯。1908年，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口，修建了上海第一座正式电影院——虹口大戏院，这个以铅铁皮修建的影院可以容纳250名观众。而此时，阮用荣也已告别了水果贩的生涯，在亚细亚油栈当上了一名工人。

到凤根（即阮玲玉）出生的1910年，雷玛斯已在上海的租界内选择人口稠密、交通便利之处又修建了两家新的电影院，从而成为上海的第一位电影院商人，他的电影院内所放映的是清一色的西洋影片，虽说在此前五年的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先生就拍出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的片断（这也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但那只能算是纪录片，中国开始拍故事影片，已是民国年间的事了。因此，阮用荣夫妇当时是不会想到他们的女儿竟会与电影这个洋玩意儿结下不解之缘。

丧 父

转眼之间，凤根满百日。

此时已届盛夏，这是阮用荣一年四季中最难受的季节，由于气温高，油栈中的煤油、汽油极易挥发，车间的通风条件又差，每天汗流浃背地干活，再被这些难闻的气味熏着，那滋味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家，那间顺着人家厨房搭起的小屋的家，经过一整天烈日的暴晒，也已是闷热不堪。阮用荣日复一日地奔波在油栈和家庭之间，为一家四口的温饱而辛勤操劳。他的妻子何阿英则悉心操持家务，照料着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两岁了，可身体非常瘦弱，病病歪歪的，凤根虽说也不胖，倒也还算平安，且长得越发讨人喜爱了。富人家的孩子过百日，是要大摆宴席庆贺一番的，可阮用荣夫妇太穷了，别说摆宴席了，就连给凤根买把“长命百岁”银锁的钱也没有，阮用荣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天渐渐的转凉了，阮用荣每天下班回家，顾不得一天的劳累，总要轮番抱抱这一双可爱的女儿。听着女儿那咯咯的笑声，阮用荣的心中便感到了一种满足。

10月底的一天傍晚，下班后的阮用荣照例抱起了女儿，他觉得凤根那小小的身子有些发烫，就问妻子：“凤根是不是病了？”

“是啊，”妻子答道，“早上起来她就有些发烧，可能昨晚受了点凉，伤风了，大概不碍事的。”

孩子伤风感冒是常有的事，阮用荣也不以为然，喂她喝了点米汤，就让她早早地睡了。可是到了半夜，凤根的热度越来越高了，一张小脸烧得红彤彤的，而且还出现了呕吐和抽搐，这可吓坏了夫妻俩，他们守着凤根，直到天亮也没敢合眼。

即使这样，阮用荣第二天仍不敢不去上班，行前他再三叮嘱妻子，带孩子去给郎中看看，到底是生了什么毛病。天渐渐亮了，凤根哭闹了一夜，此时已昏沉沉地睡去。借着日光，何阿英看到，凤根的左脸颊上出现了数个暗红色的丘疹，她的心猛地一紧，一个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难道是出天花？”当“天花”二字在脑

海闪出后，她颓然跌坐在床前，她真希望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可是她所料并不错，凤根所患的的确是令每个母亲听了都胆战心惊的天花。

天花这两个无论是读起来和写起来都很漂亮的字眼，所代表的却是一种让人为之恐怖和厌恶的急性传染性疾病，它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对患者生命的威胁，而且还在于对人容貌的毁损。当时大凡出过天花的人，都难逃满脸麻子的厄运，凤根的母亲面对患此疾病的女儿，怎能不忧心忡忡？

阮用荣下班回家后知道了女儿的病况也着急异常，但疾病既来也别无他法，只有祈求老天保佑，何阿英更是虔诚地拜倒在观音像前。顺便说一句，何阿英是笃信观音菩萨的，其虔诚已到了痴迷的程度。

不知是阮用荣夫妇的祈祷发生了作用，还是凤根的生命力特别强，经过了阮用荣夫妇日夜担忧的几天之后，凤根奇迹般地痊愈了，仅仅是在左颊留下了几点浅浅的疤痕，不经意根本看不出来。

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阮用荣夫妇刚刚松了一口气，谁知厄运再次降临到他们头上。在经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后，他们那一直病弱的长女不幸夭折了，她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个春秋。抱着长女渐渐冷却的瘦小的身体，阮用荣夫妇伤心至极。现在，他们只剩下凤根这唯一的女儿了，他们对她更是怜爱有加。这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翌年，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阮用荣剪去了脑后的辫子，仍在亚细亚油栈当机器工人，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过了农历新年，按照当时流行的计岁方法，凤根就算3岁了，实际上她还不足两周岁（以下凡述及阮玲玉的年龄均按当时的习惯以虚岁计）。尽管身体瘦弱，却仍显露出了她的聪明，不仅早就会讲话，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流利，还能逼真地模仿大人的腔调和

动作，十分可爱。阮用荣夫妇都是广东人，在家讲的是家乡话，因而凤根讲的也是一口纯熟的粤语。夫妻俩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不过可爱的小女儿给了他们精神上很大的慰藉，他们视她为掌上明珠，在她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何阿英更是每天三次向观音像上香叩拜，求菩萨保佑凤根平安，不管多忙，此事决不耽误。

然而，在这年的6月，凤根又一次突然发起了高烧，而且出现了惊厥抽搐，症状较之上次出天花时更为可怕。阮用荣上班去了，不在家中，何阿英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担心难道天花又复发了不成？想到天花，她越发慌张起来。好心的邻居建议她赶快带孩子去看医生，她才抱起凤根急步出了家门。阮家离医院有一段不短的路程，为了尽快赶到医院，何阿英抱着凤根登上了平日从不舍得坐的有轨电车。由于很少乘车，加之心慌意乱，到站时车尚未停稳，她就急步冲下，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在倒地前的一刹那间，为了保护怀中的凤根，她下意识地用右手向地下撑去，右臂随即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她当时也顾不了许多，爬起来就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医生在给凤根做检查时，何阿英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医生连连摇头，告诉她这回孩子得的肯定不是天花，因为得过天花的人就有了终身免疫力，决不会第二次得此病的，此次孩子发生惊厥抽搐，主要是因为高烧加上孩子体质太弱引起的，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听了医生这番话，何阿英松了一口气，这才感到右臂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原来，她右手臂的一根骨头已经跌断了。

回到家中，她忍着伤痛，守在凤根的身旁，寸步不离，直到阮用荣下班回来。阮用荣看着病中的女儿，很是焦急，真恨不得此病生在自己身上，而别让女儿受罪；为了不让丈夫担心，何阿英对自己的臂伤只字不提。一直到三天后凤根的烧退了，她才去请医生诊治臂伤。由于耽误了接骨的最佳时间，从此落下了病根，在以后的岁月中，每逢阴天下雨，她的右臂都疼痛不已。

又是一年过去，1913年，凤根4岁了。这一年，阮用荣一家搬到了浦东的亚细亚工人住宅居住。这个所谓工人住宅，实际上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居住于此，阮用荣免去了早晚上下班的长时间奔波，且住房比之原先在朱家木桥的那间小屋要宽敞一些，因而一家人都挺高兴。在这里，阮用荣有了稍多一点的时间和凤根呆在一起，每天吃过晚饭，他总要带着女儿到附近散散步，逗得凤根高兴了，她就会给父亲来段家乡小调，凤根唱得实在是好，常常让阮用荣开心得合不拢嘴。他感到女儿委实有些唱歌的天赋，只是缺乏调教，穷人家的孩子哪能学得起音乐，但他仍下决心带凤根去看了一场歌剧。在剧场，年仅5岁的凤根看得津津有味，回家后即能维妙维肖地模仿剧中的歌舞，连阮用荣也不由得暗暗称奇。

这一年多的时间是阮玲玉幼年时期最为平静的一段时光，可惜好景不长，1915年，亚细亚油栈的外国老板决定拆除亚细亚工人住宅，阮用荣一家又被迫搬迁。为了寻找新的栖身之地，阮用荣到处奔波，却四处碰壁，房租高得令他望而却步，而搬家之事又刻不容缓，真令阮用荣一筹莫展。最后还是何阿英的义姐帮他们在北四川路武昌路同仁里找到了一个租金还不算太贵的亭子间，总算安下身来。但从此阮用荣每天上下班又得在浦西浦东之间往返奔走了。此时的阮用荣正当44岁的壮年，可是，长年的辛苦劳累加之恶劣的工作环境，已拖垮了他的身体。当他们迁回浦西后，他总是觉得提不起劲来，起初他还以为是因为刚搬到浦西，每天上下班要走很多路给累的，习惯了就会好的，在住到浦东亚细亚工人住宅之前，有好几年时间不也是这样走下来的嘛。可是一段时间后，身体情况不但没有好转，相反更糟了，下班前的两三个小时，他犹感吃力，常常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坚持到下班，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到家时，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久，他开始长时间的低烧不退，面颊上常现酡红，每天下午尤甚，这

是肺病的典型特征，他的肺已被油栈的各种有毒气体给熏坏了。肺病是一种“富贵病”，在当时基本上无药可治，只有靠静养才能拖延岁月，承担着一家生活重任的阮用荣又如何能歇得下来？只能拖着病体苦撑着，直到一天下班时晕倒在家门前。从此，他再也不能上班了。

阮用荣这一病倒，工作也就丢了，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这可愁坏了阮用荣夫妻俩，要为阮用荣治病，一家三口还得吃饭，还得付房租，哪来的钱呢？无可奈何之下，何阿英只好丢下重病的丈夫和幼小的凤根外出帮佣，但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家用尚且不够，哪里还能剩下给丈夫买药治病的钱呢？于是，家中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慢慢地都被送进了当铺。

阮用荣卧床不起，贫病交加使他心急如焚，病况一天天地加重，他明白自己已来日无多，心中更是伤感，他实在放心不下这个家，他一旦离去，留下一对孤儿寡母该如何生存。何阿英也是终日忧愁，在雇主家，还得强打笑容。待操劳一天回到家中，面对病中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儿，她更是欲哭无泪。稍一得空，总是跪倒在观音像前，祈祷菩萨保佑她的丈夫度过这一劫难。然而，菩萨并未显灵，在这一年夏天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阮用荣终于撒手西去。

何阿英母女的痛哭声惊动了邻居，第二天，阮用荣的同乡好友、何阿英的小姐妹们闻讯都赶来了。他们都为阮用荣的过早离世而悲哀，亦对何阿英这对母女的悲凉处境无限同情。大家凑钱为阮用荣买了一口薄皮棺材，将他安葬于广肇山庄坟地。

在坟地，6岁的凤根牵着母亲的衣角失声痛哭，当阮用荣的棺木下葬时，凤根伤心地问母亲：“为什么你们要把爸爸关在这大木盒子里啊？快把他放出来吧！我想爸爸，我要爸爸和我们一起回家！”

闻者无不落泪。何阿英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泣不成声。